

D 当代传媒与社会

主编 方晓红

传媒·语言·社会

◆ 俞香顺 著

◆ 新华出版社

当代传媒与社会

传媒·语言·社会

俞香顺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媒·语言·社会/俞香顺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 7
(当代传媒与社会)

ISBN 7-5011-7127-0

I. 传… II. 俞… III. 传统文化—影响—大众传播—研究 IV. G2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3764 号

传媒·语言·社会

俞香顺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 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 <http://www.xinhuaupub.com>

发行中心联系电话: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 (010) 6307201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振宏福利印刷厂印刷

*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10.25 印张 252 千字

2005 年 7 月第一版 2005 年 7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7127-0 定价: 22.00 元

主 编 方晓红

副主编 顾理平

编辑委员会

方晓红 顾理平 毕一鸣 王丽娟

张红军 石 坚 李宗绍 陈 莉

李培林 陈振辉

主编的话

方晓红

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年轻教师出一套书，以激活并释放他们的科研能量，肯定并展示他们的科研实力，是笔者的一个心愿。

酝酿这套书的出版，是在三年前，如此长的时间才完成丛书出版规划，问题不在作者，而在于主编对选题的踌躇。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学院，“文理渗透、技艺结合、软硬兼备”是本院十年前建院时的一个方针，而今已实实在在地融入本院的学科建设、专业招生、课程设置及研究方向之中了。

本院年轻的教师也因此来自于新闻学、社会学、哲学、文学、艺术学、经济学等多种专业，有着不同的学科背景，在新闻传播这个大的主题下，从事着相关又相异的教学，追寻、探索着相关又相异的研究方向。

他们或从事传媒与商业的关系研究，或从事社会发展进程中传媒价值的评价研究，或着眼于传媒与企业建设、经济建设的关联与互动，或发掘着影像在读图时代的特殊能力，探索着电视传媒中的文化传承作用，或关注最“时尚”的传播媒介，跟踪它们萌生、发展的轨迹，作几近同步的研究。总之，眼界开阔、思维活跃，角度新颖，是他们的特色，知识结构与前代

人迥异，形成了他们与前代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代沟”。

他们不再过多地关注新闻学中的传统研究命题，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各个与新闻传播有关联的层面。也因此，他们的研究已经不能完全用传统的新闻学的角度来看待，来要求，来统摄了。

在颇费周折的选择了无数个丛书主题后，我们再次回到了最初的、也是最简单的一个选题：当代传媒与社会。这个选题是朦胧的，但也许是最周全的，因为，在资讯时代，从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的角度看，新闻传播所面对的，绝不是一个抽象的大千世界，而是一个具象的社会，社会中的一切，无不与新闻传播并行，与传播媒介形同唇齿，新闻传播研究的“对象”尽在“社会”中。用“社会”这一概念来涵盖研究对象绝非大而无当。

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作者的年龄大多在26-38岁左右，硕士或博士，富有活力与生机。

他们的优势明显，张力无限，当然他们也有着稚嫩与缺憾。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专业在新世纪中成为江苏省省级重点学科，丛书作者与该专业的全体成员一起为重点学科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丛书的出版也为这一“建设”增砖添瓦。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们也同样是本主编应当感谢的对象。

序 言

近代大众传播肇始于 19 世纪 30 年代，时至今日，大众传媒的影响力已经无远弗届、无微不至：“高度发达的媒介，堪称现代社会一大奇迹。它不仅以速率、规模惊人的‘信息流’席卷世界，造成奇妙的‘地球村’景观；而且以广度、深度空前的‘情感流’、‘影响流’渗透人心，产生全新的‘媒介文化’现象。……在此环境中，媒介对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的作用和功效（无论正负），自然变得前所未有的重大和深刻。”^①

大众传媒对语言的影响也是大众传媒对社会影响的范畴之一。无论是口语传播、文字传播，还是印刷传播、电子传播，都是主要凭借语言来传递和交流信息的。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曾言：“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做出这样的结论：除了正常言语之外，其他一切自主地传达观念的方式，总是从口到耳的典型语言符号的直接或者间接地转移，或者至少也要用真正的语言

^① 张国良主编，《新闻媒介与社会》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符号做媒介。”^① 值得注意的是，萨丕尔此处所指的语言与我们通常所指的语言不同。语言通常指语言与文字，也就是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萨丕尔的语言则是通常所指的“子概念”。按照萨丕尔的观点，语言是“第一义”的，而文字是“第二义”的：“基本听觉符号好比是商品和服务，而视觉符号是流通媒介，是货币。”^② 本书所论述的语言兼指语言与文字。语言是大众传媒的工具，同时大众传媒对语言也有着反作用，比如大众传媒在语言变革、语言规范、词语变化等领域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众传媒语言是社会语言的组成部分，同时由于大众传媒的巨大威力，大众传媒语言对社会语言环境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大众传媒语言应该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之一。社会语言学的思想发端于索绪尔，法国社会学派和布拉格学派对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兴起的。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不是单一的，是有变异的；变异又分地方性的和社会性的。传统语言学的研究限于语言的内部关系，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从语言外部关系着眼，后者的活动开拓了新的领域。传统语言学主要是从静态、共时的角度研究语言，而社会语言学是从动态、历时的角度研究语言。大众传媒语言的研究借鉴了社会语言研究的思路、方法。

从以上简短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传媒、语言、社会是

① [美] 爱德华·萨丕尔著，《语言论》第19页，陆卓元译，陆志韦校订，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② [美] 爱德华·萨丕尔著，《语言论》第18页，陆卓元译，陆志韦校订，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共构关系；而在大众传播时代，传媒无疑起着“轴心”的作用。《传媒·语言·社会》即对这种共构关系展开论述。本书分为八章。第一章“传媒：语言变革的急先锋”、第二章“传媒：语言变化的风向标”、第三章“传媒：语言规范的前沿地”，这三章是论述传媒对语言的能动作用。第四章“当代传媒语言概览”是承上启下的一章，从语体角度描述当代传媒语言的特色。第五章“传媒语言与道德文明”、第六章“传媒语言与法制建设”、第七章“传媒语言与语言传统”、第八章“传媒语言与全球化”，这四章是将传媒语言置于不同的语境中进行考察，从而揭示传媒语言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本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2003 年度基金项目“新闻传媒语言规范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敬祈专家学者不吝指教。

目 录

主编的话 方晓红 (1)

序言 (1)

第一章 传媒：语言变革的急先锋 (1)

一、白话文运动的渊源：明代思想启蒙与文学创作
..... (3)

二、白话文运动的前奏：清末《时务报》与
《中国白话报》 (7)

三、白话文地位的确立：《新青年》等刊物的宣言、
争鸣、创作 (18)

四、白话文运动的深入：《申报·自由谈》、
《社会月报》的讨论与《解放日报》的改版、
全民办报 (25)

第二章 传媒：语言变化的风向标 (33)

一、“千年未有之变局”：新词语的“第一次浪潮”
..... (33)

二、“匆匆，太匆匆”：新词语的“第二次浪潮”
..... (40)

三、“无边光景一时新”：新词语的“第三次浪潮”	(49)
第三章 传媒：语言规范化的前沿地	(58)
一、1951年、1955年：语言规范工作的“黄金期”； 《人民日报》刊登“社论”、方案，呼吁 社会语言规范	(59)
二、1978年：语言规范工作的转折点；《人民日报》 刊登读者来信，注重自身语言规范	(68)
三、1978年以来：语言规范工作的“新时期”； 传媒倡导社会规范，注重自身规范， “双管齐下”	(73)
第四章 当代传媒语言概论	(83)
一、报刊语言	(83)
二、广播、电视、电影语言	(97)
三、网络语言	(120)
四、短信语言	(129)
第五章 大众传媒语言与道德文明	(138)
一、传媒语言暴力之一：色情化倾向	(140)
二、传媒语言暴力之二：暴力化倾向	(143)
三、传媒语言暴力之三：粗俗化倾向	(150)
四、传媒语言暴力与新兴媒体和大众文化	(155)
五、传媒语言暴力与文学语言暴力的联姻	(167)
六、传媒语言暴力的应对思考	(172)

第六章 传媒语言与法制建设	(178)
一、法制新闻：法律语言与传媒语言的联姻	(179)
二、传媒歧视性语言与宪法“人人平等”的冲突	(189)
三、传媒先验性语言与媒介审判	(201)
四、传媒贬损性语言与新闻名誉侵权案	(205)
五、传媒娱乐化语言对法律意义的消解	(210)
第七章 传媒语言与语言传统	(218)
一、新闻语言特点与古代史学、古典文学	(219)
二、大众传媒语言对古典语言的借鉴	(232)
三、大众传媒语言对古典语言的误用	(239)
四、大众传媒语言对古典修辞的借鉴	(250)
五、大众传媒语言对古典的其他借鉴	(257)
六、大众传媒语言对古典语言的“反作用”	(261)
七、大众文化语言对古典语言的借鉴	(268)
第八章 全球化与中国传媒语言	(276)
一、外国传教士、商人“入主”中国报刊， 开创近代报刊：两种语言、两种战略、 两种态度	(277)
二、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自主”报刊： 坚持汉语本位，“中文为体，西文为用”； 传媒语言中夹杂大量的与西方有关的翻译词， 食而不“化”	(282)
三、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传媒语言现象： 英语强势影响	(286)



四、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传媒语言立场:	
维护母语, 维系文明	(296)
五、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传媒语言攻略:	
让世界了解中国, 让中国走向世界	(304)
后 记	(310)
参考书目	(312)

第一章 传媒：语言变革的急先锋

白话文是现代通行的书面语，普通话也是“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白话文是与文言相对而言的，是“汉语书面语的一种。它是唐宋以来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起初只用于通俗文学作品，如唐代的变文，宋、元、明、清的话本、小说等，及宋元以后的部分学术著作和官方文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在全社会普遍应用。”^①白话文是口语的固化，是口语的书面形态；当然，白话文虽然源于口语，却又高于口语。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文、言分离，书面语与口头语分道扬镳，分属于雅和俗两个对立的范畴。文言是书面语的正宗，而接近口语的白话文则是书面语的“逆流”。精英文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书面语言，也偶尔采纳口语、俗语，但那也是以不冲击文言本体为度；他们是“以俗为雅”、“化俗为雅”，俗语消融于整个的文言话语体系中。至于纯粹用口语、俗语写成的文学作品，始终是受到正统文人抵制的。

文言文与白话文是书面语的“两翼”，孰优孰劣，很难一言以蔽之。文言与白话不仅是语言的对立，更是深层的阶级的

^①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8卷第203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

对立。文言属于统治阶层、精英阶层，白话属于被统治阶层、世俗阶层。文言体现了统治阶级的话语霸权，是“少数人专政”。从传播效果来看，白话很显然要胜一筹，冯梦龙就曾经说过“话须通俗方传远”；因为二者比较，文言毕竟是“小语种”，而白话才是真正的“大语种”。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资本主义的萌芽、启蒙思想的萌动，一批文人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发扬、传播，白话文对文言文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明代末年，随着农民起义爆发、清军入关，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夭折；白话文学在短暂的“浮出水面”之后，依旧回复为一条“暗河”，文言文依旧是正宗。清代中叶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攻破了清王朝的闭关锁国状态。兴国自强、开启民智成为当务之急；中国近代报纸承担了教化与启蒙的功能。很显然，传统的文言文已经无法担当传播重任，半文半白、纯白的报纸语言占据了主流。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清末报人大多是“改良派”，并未将白话文的应用上升到对制度批判的高度。“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白话的提倡与制度的批判互为表里。《新青年》以及当时的一些报刊或副刊是白话文运动的阵地。白话文真正地颠覆了文言，真正地实现了“取而代之”。20世纪30年代，上海《申报》等展开“大众语”讨论，这是白话文运动的“二次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随着《解放日报》改版、全民办报，白话文运动更加深入。从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在语言变革、白话文定型的历程中，传媒尤其是报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即以近代报刊为中心，考察白话文运动的过程。

一、白话文运动的渊源： 明代思想启蒙与文学创作

周作人先生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将中国的新文学追溯至明代的“公安派”、“竟陵派”。“五四”以后的新文学采用白话文；“五四”时期的白话文也可以远溯到明代中后期。唐宋以来，采用白话文进行写作者不绝如缕，如唐代的王梵志诗歌、寒山拾得诗歌；宋代朱熹的《朱子语类》与禅宗语录、宋代的话本小说等。白话文作品在民间流传颇广，但是始终未能形成潮流；明代中期以后，白话作品终于万涓成水、汇流成河，声势浩大。

明代后期，在江南富庶之地，如苏州、杭州等，手工业大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随着城市的急剧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市民的审美观念、价值观念与传统的封建伦理往往相悖。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市民可以公开地谈“利”；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市民可以公开地谈“色”。封建制度桎梏下的人性开始苏醒，哲学领域涌动着启蒙思潮；市民需要自己的文学形式，启蒙思想家也将文学作为启蒙工具，提倡白话文文学。

（一）李贽

李贽（1527 - 1602）是明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他掉臂独行、惊世骇俗。李贽提倡“童心说”：“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说》）他最讨厌的是假道学。李贽破除了文学的雅、俗成见，持开放、通达的文学观；凡是能够表现“童心”的文学就是“至文”：“天

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长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所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童心说》）李贽利用评点小说来宣扬哲学观点，开展思想启蒙运动，这主要体现在《水浒传》的评点上。李贽在评点中嬉笑怒骂，肯定李逵的率真、任性，而讽刺宋江的虚伪、迂腐。《水浒传》是中国早期优秀的白话文长篇小说，比起《三国演义》的半文半白又前进了一步；李贽为白话文学鸣锣开道。

（二）袁宏道

李贽将《水浒传》提高到了与“六经”同样的高度，确实是创辟之见；李贽的思想泽被后世，对明代后期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袁宏道与冯梦龙都是李贽的追随者。袁宏道是“公安派”的领袖，反对机械复古，提倡“性灵说”，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创作时要“信心而出，信口而谈”（《致张幼于》）。他的作品往往语言新鲜，很生活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袁宏道的作品风格：“其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明史·袁宏道传》评价道：“戏谑嘲笑，间杂俚语”。我们看他的一首诗《初至绍兴》：“闻说山阴县，今来始一过。船方尖履小，土比鲫鱼多。聚集山如市，交光水似罗。家家开老酒，只少唱吴歌。”“老酒”、“鲫鱼”等俗语在以往的文人诗歌语言中绝少见到。与李贽一脉相承，袁宏道还大力